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促进民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独立专家的报告 *

秘书处的说明

秘书处谨向人权理事会转递促进民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独立专家阿尔弗雷德·德萨亚斯依据理事会第 30/29 号决议提交的专题报告。

* 本报告附件原文照发。



一. 导言

1. 人权理事会在其第 30/29 号决议中，请促进民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独立专家继续研究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秩序的不利影响。

2. 本报告补充了独立专家向理事会提交的 2015 年报告(A/HRC/30/44 和 Corr.1)和向大会提交的 2015 年报告(A/70/285 和 Corr.1)所载分析，探讨了因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事件而导致的“监管冷”的状况的加剧，¹并证实了新拟议的投资法院制度存在着和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同样的根本性缺陷。实质上，投资法院制度缺乏若干基本保障，无法确保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各项要求。德国和西班牙法官协会分别在 2016 年 2 月 4 日²和 2016 年 5 月 23 日³的意见中对该分析表示了赞同。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之诉因无意义诉讼和无理缠讼而具有代价高昂、进度缓慢和不可预测的特征；在投资法院制度下，各国仍然容易遭遇相同种类的无意义诉讼和无理缠讼。当非国家行为体在公共管理和司法审查之外行使“特权性权力”时，就会产生重要的合宪性与法治问题。

3. 此外，本报告还探讨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法律和惯例、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对人权的影响，同时承认世贸组织多边主义比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下的惯例更加透明。独立专家确信，通过民间社会在世贸组织公共论坛上的建言献策，世贸组织还会发现自身担负着利用贸易促进人权和发展这一使命。然而，世贸组织惯例、尤其是涉及农业部门和知识产权部门的惯例反映了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所引起的根本问题。要想在尊重人权的框架内重塑贸易，就需要依靠各国议会和各国议会联盟(议联)实施更加严密的监测。第十届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在内罗毕举行；倘若能够恪守根据《多哈发展议程》作出的承诺，这次会议本来能够产生良好的结果，但是，某些国家拒不让步，企图埋没这项议程并阻碍粮食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进展，因而对会议造成了严重影响。

4. 相关问题非常复杂，后果也极其严重，以至于本报告只能被视为一项尚在进行中的工作，因为必须继续监测旧的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不利

¹ 《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5.II.D.5)；<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SDS>；“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the arbitration game”, *The Economist*, 11 October 2014；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关于欧盟与第三国之间贸易和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保护和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的意见”，布鲁塞尔，2015 年 5 月 27 日。

² ttip2016.eu/files/content/docs/Full%20documents/english_version_deutsche_richterbund_opinion_ics_feb2016.pdf。

³ <http://juecesparalademocracia.blogspot.ch/>；<http://ciarglobal.com/es/jpd-rechaza-arbitraje-ttip/>。

影响，并观察改革这一制度和删除这些条约中“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的各项举措是否能够培育出更加民主和公平的经济制度，或者极为恶劣的滥用权利行为是否仍然不受惩罚。议会对于确保对人权的保护同时促进贸易而言至关重要。2016年6月举行的世贸组织问题议会大会展现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世界期待的不只是豪言壮语。

二. 有关投资保护的事实

5. 世界贸易正日益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世界商品出口贸易额达到了19.11万亿美元。⁴ 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2014年服务贸易额超过了4.87万亿美元。⁵ 关税已经降低，不再构成重大的贸易障碍。目前已无必要通过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这类协定属于非对称协定，赋予投资者种种特权而不施加强制性义务。

6.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贸易代表强行推销和作出往往过度乐观的预测之后，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已经增至3,200项以上。对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外资)的动人呼唤依然声声不绝。提议者声称，投资保护条约对于吸引直接外资而言必不可少。国际商会等游说团体经常宣称，“强有力的投资保护标准应当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政策优先事项，以推动直接外资催生繁荣的新浪潮”。⁶ 可是，这一点并未获得令人信服的实证证据的支持。当然，部分计量经济学研究坚称这些条约吸引了投资，但其他研究则发现这些条约起不到任何作用或者具有不利的影响。⁷ 2015年，欧洲联盟贸易专员塞西莉亚·马姆斯特罗姆表示，“委员会认识到，绝大多数研究并没有证实条约与投资之间具有一种直接和排他性的因果关系”。⁸ 巴西在拉丁美洲的直接外资中所占份额最大，但该国迄今未曾批准任何双边投资条约。南非已经废除了一些双边投资条约，因为正如一名政府官员所解释的那样，“南非没有从与我国缔结了双边投资条约的诸多伙伴那里获得大量的直接外资流入，然而，南非继续从没有与我们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辖域获得投资”。⁹

⁴ <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trade>。

⁵ 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15_e/its2015_e.pdf, p. 11。

⁶ 国际商会奥地利分会，“双边投资条约和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2014年。

⁷ Lauge Poulsen, “The importance of BITs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isk insurance”,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2009/2010*, Karl P. Sauvant,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son Yackee, “Do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promo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ome hints from alternative evid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1114 (22 March 2010)。

⁸ 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AllAnswers.do?reference=E-2015-008187&language=EN。

⁹ Xavier Carim,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Afric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South Africa”, South Centre Investment Policy Brief No. 4, August 2015, p. 4。

7. 截至 2016 年 1 月，全球共计发生了 696 起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案，涉及 107 个国家。¹⁰ 由于制度不透明且许多争端解决未予公布，实际的数字可能更大。登记在册的案件中有四分之一终告解决，往往牵涉到款项支付或修改法律法规以满足投资者的要求。然而，这种商业本体论不无风险。投资者若认为风险过高，就应当购买风险保险或拒绝投资。国家不得向投资者提供利润保障。可以通过国内法院提供保护。

8. 已知案件中大约 72%是针对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随着外国投资者、仲裁员和新条约将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引入各个新领域，针对发达国家的案件数量不断增长。此类解决最终把损失转嫁给社会而使收益归属于私人，¹¹ 将会导致社会动荡。

9. 这类案件的数量正逐步上升。1995 年已知案件总数为 3 起，而 2015 年新增注册案件则高达 70 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¹² 的数据显示，投资者在 60%的可受理案件中胜诉。从原则上说，各国从未“赢”过；它们能够祈盼的不过就是得到“无罪开释”，可即便如此，它们也只能收回一部分(如有)的诉讼费，而这种诉讼费通常高达百万美元。在尤科斯环球有限公司(马恩岛)诉俄罗斯联邦案中，律师要求支付 7,400 万美元，仲裁庭的三名仲裁员实际获得 740 万美元。裁决金额达到了 500 亿美元。¹³

10. 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裁决的主要经济受益人并非小投资者或中等规模企业——它们的投资对于创造就业和长期发展十分必要，而是年收入至少 10 亿美元的垄断企业和资产净值超过 1 亿美元的个人。¹⁴

11. 仅仅因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事件的出现而呈现的监管冷的状况已经有效阻止了许多国家采取迫切需要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措施。法铭德律师事务所的彼得·卡比不无讽刺地将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描述为“一种游说工具，因为你可以开价说，‘那么，你们要这么干的话，我们就起诉要求赔偿’。在某些情况下，这确实能改变行为”。¹⁵ 世强律师事务所称投资者保护是“防止国家不法行为的一种依据……因此，它们对于外国投资者和产业协会而言，也许是反对立法变动的相当重要的工具”。¹⁶ 尽管一些条约形式上承认国家主权，但实质上

¹⁰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News/Hub/Home/504>。

¹¹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Socialising losses, privatizing gains” (Amsterdam, 2015)。

¹² 《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第 116 页。

¹³ www.iisd.org/itn/wp-content/uploads/2014/09/iisd_itn_yukos_sept_2014_1.pdf;
<http://globalarbitrationreview.com/news/article/35248/us50-billion-yukos-awards-set-aside-hague/>。

¹⁴ Pia Eberhardt, “The zombie ISDS: rebranded as ICS, rights for corporations to sue states refuse to die” (Brussels,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2016), p. 14。

¹⁵ Pia Eberhardt, “The zombie ISDS”, p. 13。

¹⁶ www.steptoe.com/publications-9867.html。

却背道而驰。大卫·博伊德教授曾经指出，“虽然贸易协议中有旨在保护政府监管权的文字，但许多仲裁小组却忽视了这些规定或者对这些规定作出了狭义解释，使它们实际上毫无用处”。¹⁷ 大卫·施奈德曼教授坦率地将这一制度描述为“一种新兴的越宪形式……目的是将经济政策与多数主义的政治隔离开来”。¹⁸

12. 若干涉及将近 90 个国家的超大区域条约目前正在谈判过程中，多半尚未公开。其中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¹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欧洲联盟与加拿大谈判的《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以及《服务贸易协定》。如果它们连同各自的投资章节一并生效，那么仲裁这个大宝库将大规模地扩张。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适当指出的那样，“公司总是试图通过秘密行动，即通过秘密谈判的贸易协定，实现它们通过公开的政治程序所无法实现的目的”，²⁰ 而且“如果说曾经有一种破坏各项基本原则的不公正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话，那么非它莫属”。²¹

三. 从保护责任到行动责任

13. 保护责任这一概念²² 是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提出的。从理论上说，它可以重申每个国家有责任采取预防性和纠正性政策以抵制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造成的结构性暴力，从而保护自己管辖下的人口免遭内外危险；但需要取决于这一概念的解释和适用方式。另一方面，狭义地将保护责任解释为允许国家干预他国内部事务的一种借口，这将引起大会在 2009 年 7 月的辩论中预示的种种危险，该辩论揭示，保护责任有可能在地缘政治方面遭到滥用，而成为规避《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关于禁止使用武力的绝对法规定的途径。虽然保护责任可以促进人权，但是它口号式的媒体宣传以及任意性和选择性适用的危险将逐渐削弱《宪章》。²³

14. 独立专家建议重新表述这一法理，以使其脱离保护人口免遭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之害这一狭隘的焦点，而延伸到保护人口不遭受战争、军事干预和结构性暴力的范围更广的义务。重申保护和积极促进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

¹⁷ www.thestar.com/opinion/commentary/2016/01/11/dont-let-trade-deals-hamper-climate-progress.html。

¹⁸ David Schneiderman, *Constitutionaliz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vestment Rules and Democracy's Promi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

¹⁹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7006。

²⁰ Joseph Stiglitz,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right to resist restrictive trade agreements”, *The Guardian*, 8 November 2013。

²¹ Joseph Stiglitz, “The secret corporate takeover of trade agreements”, *The Guardian*, 13 May 2015。

²² www.un.org/en/preventgenocide/adviser/responsibility.shtml; A/63/677。

²³ www.un.org/press/en/2009/ga10850.doc.htm。

利这一义务，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各国政府、议会和法院有责任为公共利益而努力追求经济稳定、社会发展、环境可持续、粮食安全、改善健康和完善劳动标准，通过税收和各种预防措施防范转基因生物²⁴、水力压裂²⁵、露天采矿、农药、空气和水污染、腐败、垄断和非对称贸易的危险。这些一般性治理义务是有组织社会存在的理由。这一行为责任的权利人是个人和人民，包括土著人民。责任主体则是各国政府、议会和法院。

15. 法院永远不得成为非正义的工具。它们永远不应协助执行显失公正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裁决。在滥用权利、不当得利或裁决明显证据不足(例如，仲裁员作出异乎寻常的扩大解释)的情况下，法院应当行使宪法规定权力和默示权力，拒绝执行。

16.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欧洲社会宪章》、《美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等无数区域人权条约所载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而不仅仅是承诺。

17. 似乎投资者和跨国公司狭隘地将人权理解为贸易权、财产权和利润权。引述“市场规律”²⁶之举即可证明上述看法；“市场规律”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原教旨主义或群体思维曾体现在世贸组织前任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的一次讲话中，他在2010年9月26日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会议上称，“贸易确保了人权的具体实现”。²⁷“竞争权”也是一项颇受欢迎的新自由主义“权利”。但是贸易、财产和竞争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它们必须被置于其他权利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并遵守合理的监管。竞争以公平竞争的环境为先决条件，这种环境往往要求采取扶持行动以纠正失衡状况。缺乏团结的竞争无异于捕食者行为，尤其是当竞争被操纵以服务于超大公司和垄断企业时。²⁸

²⁴ www.globalresearch.ca/the-seeds-of-suicide-how-monsanto-destroys-farming/5329947。

²⁵ www.alternet.org/environment/8-dangerous-side-effects-fracking-industry-doesnt-want-you-hear-about。

²⁶ 这些文字隐藏的内容比阐明的内容更多。“市场”并非一种自然科学规律，而是一系列权力关系。当教条主义者念起“市场规律”这个魔咒时，他意在实现超大公司的愿望。“投资”可能有利，也可能无利。虽然必须推动以长期投资方式为有益社会的活动供资，但是榨取现有资产以获得租金、股息和资本收益的管理手段危害了社会。攫取财富不等于创造财富。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贸易民粹主义构成了一种对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并不存在的“渗透”效应的乌托邦式的千禧年信仰。

²⁷ www.wto.org/english/news_e/sppl_e/sppl172_e.htm。

²⁸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Silver City, NM: Interhemispheric Resource Center, December 2003)。

四. 国际人权条约制度的首要地位

18.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以及《服务贸易协定》的所有潜在缔约国均受国际人权条约制度的约束，并且其中大多数都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社会宪章》等普遍性和区域性人权条约的缔约方。“条约必须遵守”要求各国善意履行它们的人权条约义务，并禁止它们缔结会导致拖延、逃避、破坏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或者导致履行不能的任何协定。然而，在讨论与政府官员、贸易代表和公司游说者之间的贸易对人权产生的影响时，独立专家意识到，他们并未立即感知人权层面。因此，后来有人就已经或可能遭到不利影响的人权条约规定编写了摘要。

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 第一条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他们有权自由处置自己的天然财富和资源，不得被剥夺自己的生存手段。各缔约国有义务促进自决权的实现，不能缔结实际上剥夺人民的自然资源或者导致土地掠夺或人口流离失所状况的商业协定，以此阻挠这种权利的实现。《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规定，对土著土地的任何使用均需征得土著人民的自由和事先知情同意。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1989年《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第169号)规定了自下而上的磋商和参与。²⁹

20. 第二条规定，一切个人都有权得到有效补救，例如有权就跨国公司造成的环境损害获得赔偿。但是，即便国家最高法院作出了判定某跨国公司败诉的裁决，如果该公司诉诸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并拒绝向受害者支付赔偿(例如见独立专家的其他报告所讨论的雪佛龙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诉厄瓜多尔共和国案)，那么该法院裁决也可能得不到执行。另一个问题是，个人受害者在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或投资法院制度的法庭上没有起诉权。

21. 第六条涉及生命权。跨国公司的许多活动都对生命权和健康权构成了威胁，³⁰ 例如当露天采矿、含油污泥、有毒废物和放射性污染大片区域之时。国家有义务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避免此类危险，而公司不能因此主张“利润损失”。跨国公司将工会会员的名单交给警察和准军事团体、从而造成了人权维护者的失

²⁹ A/70/301。

³⁰ 在2016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的开幕式上，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警告说，“人为的灾害，是因为一些政策将经济利益置于对人类生命以及维系生命的地球的关爱之上”，www.who.int/dg/speeches/2016/wha-69/en/。

踪和死亡，这已然属于犯罪。³¹ 为迎合跨国公司的利益而动用国家警察、甚至有时候动用军队以对付示威者的行为，有时候会导致人员死亡。制药工业中所谓的“经久不衰”的专利也可能引致死亡，因为缺乏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取通用名药和医疗设备的途径。

22. 第十二条涉及自由迁徙权。一部分超大项目业已造成了人口的非自愿迁徙以及失去家园、教堂和墓地的情形。³² 石油、天然气和采矿工业在导致地貌景观满目疮痍的同时，还摧毁了生态系统，因而引发了人口迁移。如果环境遭到了严重污染，那么人们就无法重返故土。

23. 第十四条涉及正当程序权。所有法律诉讼必须由一个独立的法庭依照透明和问责制原则进行判决。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法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缺乏独立性、透明度、可预测性和问责制。这种倒退有损于以公共法院为基础的法治。一些仲裁裁决破坏了分权原则，例如，在雪佛龙案中，仲裁员命令厄瓜多尔政府插手干预独立的厄瓜多尔司法机关，推翻厄瓜多尔法院的判决。

24. 第十九条涉及获取信息权，包括获取关于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的信息的权利。消费者群体、环境保护专家、工会和医疗卫生工作者等多方利益攸关方需要获得精确的信息以评价贸易协定对社会的影响。他们不应被动地依赖举报人提供信息。隐秘性会对民主和法治产生腐蚀作用。

25. 第二十一条涉及和平集会权。反对超大项目的示威者遭到了骚扰、拘留，部分人甚至遭到了杀害。³³

26. 第二十四条涉及儿童的权利。根据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裁决向跨国公司支付的赔偿减少了用于促进儿童权利、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提供更优质教育的公共基金。

27. 第二十五条涉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而秘密拟订和谈判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不经议会监督而通过这些条约和协定的行为系统性地侵犯了这一权利。鉴于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和投资法院制度会给法治和人权带来种种危险，此类协定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如果条约谈判过程没有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或者条约规定在公布后遭到公众大规模反对，那么议会不得加速相关条约的批准进程。逾 330 万欧洲人签署了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的请愿书，欧洲联盟委员会举行的公众咨询的受访者中也有 97% 表示拒绝。³⁴

³¹ Horacio Verbitsky and Juan Pablo Bohoslavsky, *Cuentas Pendientes* (Buenos Aires, Siglo XXI Editores, 2013);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n/21/berta-caceres-name-honduran-military-hitlist-former-soldier.

³² A/HRC/32/40。

³³ A/HRC/29/25。

³⁴ Pia Eberhardt, “The zombie ISDS”, p. 5。但是欧洲联盟委员会没有意识到这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究竟为什么要纳入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仲裁？

28. 第二十六条涉及法律面前的平等。给予外国投资者特殊权利而将本国投资者和公司排除在外，此举侵犯了法律面前的平等权，也违反了禁止歧视的规定。

29. 第二十七条涉及少数人的权利。在土著人民获得《公约》第一条保护的同时，少数群体也要求保护他们的文化和生计，因为跨国公司糟蹋环境、狩猎、捕鱼以及获取洁净水等行为频频破坏他们的文化和生计。

B.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30. 正如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所阐明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和投资法院制度对人们享受《公约》规定的绝大部分内容具有不利影响。

31. 第六条涉及工作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超大协定已经导致了数百万工作职位的丢失以及劳工权利方面的底线竞争，例如，制造业的工作职位从美利坚合众国转移到了墨西哥的边境加工厂，而这些加工厂以其非人的工作条件和极低的工资报酬而臭名昭著。

32. 第七条涉及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该项权利的第 23(2016)号一般性意见中强调，贸易协定必须保护这一权利。

33. 第八条涉及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工会会员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目标，往往会遭到解雇，有时候还会遭受私营保安公司和准军事团体实施的暴力行为。

34. 第九条涉及社会保障权。将工作职位转移到社会保障立法不完善或不不存在社会保障立法的国家，此举违反了关于逐步实现这项权利的承诺。委员会关于社会保障权的第 19(2007)号一般性意见指出，有关贸易自由化的协定不应限制缔约国确保充分实现社会保障权的能力。

35. 第十条涉及对家庭的保护，并且要求缔约国对作为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的单元的家庭给以尽可能广泛的保护和协助。此外，对于母亲，缔约国应在其产前和产后给予带薪休假；对于儿童，缔约国应保护其免受经济和社会的剥削。

36. 第十一条涉及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的权利。在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发达国家获得补贴的农产品加工业作出的关于提起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之诉的种种威胁，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采取各项农业政策以确保粮食安全。³⁵ 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裁决和投资法院制度可能作出的判决剥夺了国家政府用以履行其保健、住房和教育义务的必要资金。

³⁵ 《贸易和投资协定对人权的影响评估指导原则》。

37. 第十二条涉及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所谓的制药工业专利“经久不衰”减少了通用名药物的获取机会。³⁶ 故意不提供挽救生命的药物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

38. 第十三条涉及受教育权。教育私营化导致了已经失去平衡的竞争环境进一步恶化，使贫困家庭更加难以帮助自己的子女摆脱贫穷。

39. 第十五条涉及享有自身文化的权利。这种文化包括人们自身语言以及电影、电视和音乐对人们自身语言的使用。一旦被廉价的外国电影和电视包围和吞没，人们将会丧失其身份认同。各国政府有义务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促进多样性、反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宗旨，保护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本国人民的文化。

40. 除了关于自决权的第一条以外，第二十五条对土著和非自治人民至关重要。第二十五条重申，《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所有人民充分地 and 自由地享受和利用它们的天然财富与资源的固有权利。伐木、石油、天然气和采矿工业掠夺了土著资源。

41. 各项区域人权保护制度、《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 5、6、8 至 11、13 和 14 条)、《欧洲社会宪章》、《美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确立了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义务，这些义务要求采取积极主动的执行措施和扶持行动，以消除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状况以及殖民主义和歧视带来的后遗症。

42. 尽管贸易的人权层面显而易见，但是投资者和公司认为它们可以在一个没有人权的地带继续工作。种种事实“不会产生任何后果”，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推土机隆隆前进，完全无视数十亿遭受剥削且生境被破坏的人的利益。

五. 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投资法院制度以及国家主权

43. 独立专家经过对贸易和人权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完全改变了有条件支持国际投资法院的立场(见 A/HRC/30/44 和 Corr.1, 第 62 (i)段和第 66 (a)段；以及 A/70/285 和 Corr.1, 第 55 (a)段)。他在重新评价各种危险后，认为投资法院制度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

44. 2015 年 9 月，欧洲联盟贸易和工业专员塞西莉亚·马姆斯特罗姆建议以投资法院制度替代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投资法院制度尽管有一些改进，包括引进了一种上诉机制和法官任命制，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

³⁶ A/69/299。

端解决问题，而且致使潜在的申诉数量增加了九倍，³⁷ 从而导致情况更加恶化，因此进一步加剧了监管冷的状况。投资法院制度必须弃置，理由如下：

(a) 该制度是一种单向管辖，投资者可以起诉国家，而国家不能起诉投资者。它以仲裁模式为基础，并且正如德国和西班牙法官协会所认为的那样，它是一种伪法院，缺乏确保一种独立法律制度的各项基本保障；

(b) 该制度并未规定投资者的义务，例如“不损害”原则，或者遵守环境、社会、劳动、健康或安全标准；

(c) 外国投资者享有特权并且可以规避所在国法院的管辖，这与所在国的本国投资者和公司不同。此处不存在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

(d) 对“投资”、“间接征用”、“公正和公平待遇”以及“合法预期”这些用语的扩大解释使投资者得以起诉国家，即便所抨击的立法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e) 由于举证责任倒置，国家必须证明其社会立法是“合法的”并且“不过分”，从而引导投资者起诉预防措施以及健康和环境立法；

(f) 制冷效应或监管冻结变本加厉，因此国家可能不敢实行社会立法，因为担心被起诉要求数百万美元的赔偿；

(g) 该制度没有赋予投资者诉讼的受害者以起诉权。

45. 根据拟议的投资法院制度，人们可能会提出下列未决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案，由此产生类似的诉讼费用和数十亿美元的裁决金额：

(a) 菲利普—莫里斯品牌有限责任公司等诉乌拉圭案，于 2010 年提起，至今尚未结案，在该案中，这家烟草业巨头起诉乌拉圭要求其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规定的义务；

(b) 孤松资源公司诉加拿大案，涉及魁北克省颁布的一项预防性水力压裂法暂停规定；

(c) 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等诉德国案(2009 年)，涉及汉堡实施的燃煤发电厂用水方面的环境标准；

(d) 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等诉德国案(2012 年)，涉及德国关于逐步淘汰核能的决定；

³⁷ Natacha Cingotti and others,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put to the test”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Friends of the Earth Europe, Forum Umwelt und Entwicklung and 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Amsterdam/Brussels/Berlin/Ottawa, 2016); Maude Barlow and Raoul Marc Jennar, “Le fléau de l’arbitrage international”, *Le Monde diplomatique*, February 2016.

(e) 横加公司和横加管道有限公司诉美利坚合众国案，涉及奥巴马总统决定反对建设颇具争议的基石 XL 输油管道、并以此作为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的一部分一事；

(f) 科西格资源有限公司等诉哥伦比亚案，涉及拒绝允许在亚马逊雨林地带采矿一事。哥伦比亚被起诉，并被要求支付 165 亿美元的“利润损失”。

46. 此外，同样类型的案件即便已经在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下由仲裁员作出了有利于公司的裁决，也可以提交拟议的投资法院制度，其中包括：

(a) 威廉姆·拉尔夫·克莱顿等诉加拿大案，涉及阻止在某个生态敏感地点建设一个大型采石场和海运码头的一项环境影响评估；

(b) 铁壳公司诉墨西哥案，涉及拒绝允许存放有毒废物一事。

47. 这些案件引起了人权和宪法问题。国家能够在宪法上允许这种对其政策空间的干预吗？国家能够否认其有义务采取预防措施、主张人权、开展健康和环境影响评估、³⁸ 规范税收或提高最低工资吗？国家保护人民的宪法义务不仅在于防止敌军入侵进犯，还在于防止私人行为体的侵害，这些私人行为体包括垄断企业、卡特尔和公司捕食者。国家有义务禁止某些商业活动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和福利。任何国家都不能不理睬独立、透明且负责任的公共法院。

48. 另一个问题涉及据称给予的同意的法律效力。批准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是否已经实际同意接受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或投资法院制度的这种失控管辖？这种同意是已经完备有效，还是尚未真正生效？习惯国际法有一项强制性准则，即管辖应以同意为基础。这一准则依据的是主权国家的惯例。

49. 为了阐明这一点，可以回顾指出，国际法院的管辖并非普遍或自动管辖，而需要以国家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作出的声明为条件。这一同意声明也可以撤回。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可以通过专项妥协和解同意国际法院的管辖。而确立管辖的另一种可能性源于条约条款，国家根据这些条约条款承诺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目前有 300 多项条约载有此类条款，例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其他条约则在其任择议定书中规定了自动提交，例如《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若干《任择议定书》。正如《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规定的那样，此类同意可以撤回。

50. 在未获得相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法庭没有管辖权。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和投资法院制度、它们的“保护伞条款”和“存续条款”违反了管辖以同意为基础这一准则。既然各国可以拒绝国际法院的管辖，那么它们更有理由拒

³⁸ 《贸易和投资协定对人权的影响评估指导原则》；James Harrison and Alessa Goller, “Trade and human rights: what does ‘impact assessment’ have to offer?”,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vol. 8, No. 4 (2008), pp. 587-615。

绝由三名私人仲裁员组成的特设仲裁庭的管辖，尤其是在这种仲裁庭侵犯国家基本职能的情况下。

51.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二条规定，当协定缔结时存在之情况发生基本改变时(情势变迁)，可以修订或终止该协定。《公约》的其他规定允许在错误(第四十八条)、欺诈(第四十九条)、贿赂(第五十条)或强迫(第五十一至五十二条)的情况下修订或终止协定。

52. 正如外交官发言和学术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当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缔结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时，任何人几乎都不会想到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下的仲裁员会质疑国家在税收、健康、劳动和环境标准、国家基本法和国内法庭判决领域内的本体论的职能。这种对主权的放弃应当在条约和协定的案文中绝对清晰地表明，而不是采用可以任意加以解释的模糊措辞表达。习惯国际法推定认为，国家不能因意外或疏忽而放弃主权，因为国际公共秩序不能接受国家推卸其履行职能的责任。如果国家这样做，那么协定可以视为“违反善良风俗”。

53. 在与游说者和贸易代表的谈话中，独立专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国家起初为什么要签署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对此，丹麦政治学家劳厄·波尔森给出的也许是最佳答案，他曾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研究，并向许多政府官员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定性证据和计量经济学证据两者均有力表明，有限理性框架最适合解释发展中世界双边投资条约盛行的原因……发展中国家政府过高估计了双边投资条约的利益而忽视了其中的风险，往往将这种条约视为单纯的‘友好象征’”。³⁹ 波尔森认为，发展中国家期望这种条约能带来更多的外国投资，⁴⁰ 但是这种期望从未得到实证证据的支持并且绝大多数都落空了，同时它们依赖为这种条约进行的正面“宣传”和贸发会议的建议，从而导致人民受损。他评论说，各国政府多半没有意识到各种政治和经济风险，条约谈判仅仅持续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没有来自司法部的律师或专家参与。波尔森得出结论认为，“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签署某项保障经济全球化的最强有力的国际法律制度时，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⁴¹ 这一评估提出了有关推销条约一方的善意的问题，表明了应有的注意的过度缺失，并且可能引导到贿赂和腐败方面的嫌疑。制定条约不能成为一种“请君入瓮”、然后以“存续条款”为要挟的赌博。总之，投资保护机制不能导致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手中转移到私人方面。目的或后果不

³⁹ www.cbs.dk/files/cbs.dk/abstract.pdf。

⁴⁰ Lauge Poulsen,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Economic Diplomacy: The Politics of Investment Trea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www.oecd.org/trade/benefitlib/。

⁴¹ Lauge Poulsen,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Economic Diplomacy*, p. xvi。

合情理的合同⁴²无效，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五十三条，必须宣告完全无效。

54. 鉴于管辖是以同意为基础，因此，查阅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的准备工作资料，查明投资者和跨国公司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并进行了充分的披露，以及查明国家是否清楚知晓种种利害关系并表达了有效的同意，这将大有助益。双方在制定条约时都抱有合理期望。在不利后果有可能超过潜在利益的情况下，国家不会同意签署条约。如果不清楚说明这些危险和不利后果，那么就不能作出同意推定。

六.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惯例

55. 独立专家感谢世贸组织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耗费了大量时间处理他的调查问卷(见附件三和四)并在双边会议上解释了他们的重要工作的许多方面。

56. 他还感谢前任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尔·德·舒特分享了他对于世贸组织规则和惯例对食物权乃至更一般性人权的影响的见解。

57. 独立专家承认商业活动会导致多方面的人权问题，但是相信世贸组织等多边组织存在的意义。这些组织有机会也有机制以引导贸易工作服务于人权和发展，譬如，通过《多哈宣言》，它规定将豁免最不发达国家执行医药产品专利的义务的过渡期予以延长。⁴³ 缔约国的善意友好以及追求更高程度国际团结这一心态转变是出发点。

58. 自从 1999 年在西雅图举行的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以及民间社会就商业对人权造成的不利影响提起强烈抗议以来，世贸组织越来越意识到贸易的人权层面。在 2008 年全球粮食危机发生之后，联合国秘书长设立了全球粮食安全危机高级别工作队，旨在对危机实现协调一致的应对，世贸组织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等 20 多个国际组织均参与其中。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共同提出的三边倡议也允许政策对话和经验交流。自 2001 年以来，世贸组织组织了一个年度公共论坛，⁴⁴ 在该论坛上，来自民间社会、学术界、工商企业、媒体、国家政府、议会和政府间组织的 1,500 名代表就如何挖掘潜力以实现多边合作和增长以及如何最好地履行《多哈发展议程》的各项承诺问题分享了他们的知识并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⁴² 夏洛克与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之间的合同就违反了善良风俗，因为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不能成为取人性命的理由。以此类推，当国家无法偿付投资者时，后果不能是干涉主义——这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公开统治时期的做法，最近基金组织和中央银行施行“紧缩措施”和“私有化”也体现了这一点；A/65/260 和 A/69/273。

⁴³ 附件四。

⁴⁴ 过去称之为“公共讨论会”，www.wto.org/english/forums_e/public_forum_e/public_forum_e.htm。

59. 虽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可以允许成员国保留某种政策空间，即允许它们排除一旦经商业开发、就可能对人类、动物、植物生命或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各项发明的专利性，并且可被援引以拒绝转基因作物，⁴⁵ 但是国家的政策空间仍然远远没有得到保障，监管冷的状况可能依然会阻止国家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必须清楚说明人权、健康和环境保护的优先性。

60. 世贸组织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至 19 日在内罗毕举行了其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此前发布的一份联合新闻稿中，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与独立专家一道敦促各国政府履行《多哈发展议程》以及不违背满足发展中经济体各项需要的承诺。“如果贸易是为了人权和发展，那么它就应当促进实现适足食物权、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权以及享有洁净的生活环境的权利。”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违反《议程》：“必须在全球贸易规则的框架内重申各项人权义务，以确保世贸组织谈判和规则支持发展努力，消除饥饿、疾病和贫穷的根源，加强保护和促进人权，最终确保实现新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⁴⁶

61. 参加内罗毕会议的大多数国家都赞同重申多哈框架，但是部分发达国家的反对阻碍了达成共识。据报告，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是为了引入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将影响促进发展权。在答复独立专家发出的问卷调查时，沙特阿拉伯指出：“世贸组织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结束多哈发展议程议题。世贸组织的多数成员都是发展中国家。圆满完成多哈回合将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极大地促进它们实现经济增长和融入全球经济。此外，完成多哈发展回合将解决世贸组织各项协定中的贸易扭曲和失衡状况，维护给予发展中国家在特殊[和]差别待遇方面的灵活性……建立世贸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⁴⁷ 在序言中明确规定了‘提高生活水平，确保充分就业和大幅度、稳步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这一目标。”

62. 世贸组织在促进贸易的同时，应当将人民置于利益之上，将发展置于垄断企业扩大之前。2015 年，华盛顿经济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黛博拉·詹姆斯评论说：“尽管达成了全球共识，但是世贸组织规则仍然与几十年前无异。世贸组织规则不允许 1994 年没有实施补贴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超过世贸组织所有成员享有的最低限度数额的补贴。同时，美国和欧洲每年可以为出口产品提供数百万明显扭曲贸易的补贴，至今没有执行它们在将近 10 年前就已经同意的取消这些补贴的做法。”

63. 世贸组织如果被纳入联合国系统并遵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那么将会便利这些承诺的履行。依照《宪章》第五十七条和第六十三条将世贸组织纳入，可

⁴⁵ 附件四。

⁴⁶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6870&LangID=E。

⁴⁷ 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04-wto_e.htm。

以确保它不仅能像其自豪地宣称的那样，积极促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而且能适当重视作为其自身根本法一部分的人权。

64. 内罗毕部长级会议达成了若干关于农业出口补贴、粮食援助和其他问题的协定。然而，涵盖了全球定位系统、导航系统和医疗产品(例如磁共振成像机)等产品的《信息技术协定》主要是由高收入国家起草的。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的国家没有代表参与，中低收入国家中仅一国有代表参与。

65. 通过一项关于用于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之合法性的明确声明既有必要，又符合减少贫穷的承诺，它允许各国拥有粮食库存，并使各国能够解决粮食短缺和全球市场价格波动的问题。

66. 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维护了棉花方面的减让——对于西非国家而言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富裕国家却赢得了农业出口补贴战役的胜利，而没有取消《欧洲联盟共同农业政策》等一般性补贴计划。评论员指出，“在不公平的世贸组织竞争环境下，富裕国家的补贴计划被划归为‘可允许的’，而贫穷国家则被禁止补贴其农民，这种情形将持续下去”。⁴⁸

67.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定达成仅仅三个月后，内罗毕部长级会议在执行具体目标 17.10 方面就遭遇了失败，根据该具体目标，各国将“通过完成《多哈发展议程》谈判等方式，推动在世界贸易组织下建立一个普遍、以规则为基础、开放、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这一悖论凸显了需要重新思考全球贸易制度和某些谈判人员歪曲的意识形态做法。除了多哈和内罗毕以外，世贸组织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人们普遍认为“发展”等同于贸易额和出口量的增长或者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联合国宪章》主张另一种发展观，即要在一个日益民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下实现发展、团结和人权。

68. 尽管美国和欧洲联盟的新闻评论宣布《多哈发展议程》“已死”，但是《内罗毕宣言》第 30、31 和 34 段给予了人们希望的理由。⁴⁹ 它们一方面承认陷入僵局的情况，另一方面又指出，《多哈工作方案》是一个独立的任务，意味着西方国家不能择优挑选某些部分作为重点事项。看起来，发展中国家必须继续为该方案独立任务的谈判议程而努力奋斗。无论如何不能将美国和欧洲联盟所设想的、任何有条件的诸边协定纳入世贸组织条约框架，除非就此在部长级会议上达成了共识。⁵⁰ 可是，在 2013 年举行的巴厘部长级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在同意将《贸易便利化协定》作为一项单独的协议时，放弃了它们最强大的优势。考虑到该协定尚未生效，人们可以建议发展中国家拒绝交存批准文书，直至确保它们自

⁴⁸ www.globaljustice.org.uk/blog/2015/dec/23/what-really-happened-wto-summit。

⁴⁹ 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c10_e/mindecision_e.htm。

⁵⁰ <http://thewire.in/17950/news-of-dohas-death-may-be-premature-but-india-china-must-fight-to-save-the-day/>; Chakravarthi Raghavan, *The Third World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CE* (Penang, Third World Network, 2014)。

身的需求、包括关于“可交付成果”的内罗毕决定被写入包含《多哈工作方案》成果的单一议定书之中。

69. 2016 年 6 月 13 日和 14 日举行的议会世贸组织问题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成果文件指出：“我们赞赏关于用于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的决定，并呼吁结束有关寻找永久性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谈判……我们认为粮食安全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世贸组织规则必须支持为消除饥饿作出的各种努力。根据该决定，我们还希望强调加快通过一项专门保障机制的重要性……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和政治参与是推进《多哈发展议程》所有剩余问题的关键。”

七.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

70. 2016 年 2 月 24 日，世贸组织一个争端小组通过了一项决定，反对印度通过扩大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可再生能源的工作。⁵¹ 人们可能会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之后，每个人都会支持这类举措，但是世贸组织争端小组似乎陷入了自己的咒语之中，在接受气候变化引起的新的优先事项方面无法灵活应对。尽管该领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举措，例如世贸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但是人们仍然不愿对《1994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规定的一般性例外作出广义解释。⁵²

71. 印度的《国家太阳能计划》旨在根据关于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7 增加该国的可再生能源，是一项合理的计划。它将创造当地就业，并且每年将产生 1,000 亿瓦太阳能，从而为百万人口带来洁净的能源，这符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美国向世贸组织提起这一案件，质疑印度的国内内容条款，因为该条款规定部分太阳能电池应当在国内生产。印度尝试与美国达成和解但未成功，现在可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太阳能方案以避免遭到世贸组织制裁。争端小组得出结论认为，印度的措施不符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第 2.1 条和《1994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 III: 4 条，并且不属于《总协定》第 III: 8(a)条的减损范围，也不可以依据《总协定》第 XX(j)条和第 XX(d)条的一般性例外加以解释。争端小组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印度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就该裁决提起了上诉，⁵³ 并于 5 月 13 日宣布该国将针对美国提起 16 项申诉。⁵⁴

⁵¹ 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3_e/ds456rfc_06feb13_e.htm; www.ictsd.org/bridges-news/biores/news/us-launches-new-wto-challenge-against-india-solar-incentives; and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456_e.htm.

⁵² 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06-gatt_e.htm.

⁵³ 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6_e/ds456apl_20apr16_e.htm.

⁵⁴ www.pv-magazine.com/news/details/beitrag/india-confirms-it-will-file-16-solar-cases-against-us-under-wto-dispute_100024597/#axzz49OIWwEFn.

72. “地球之友”评论说：“世贸组织裁决印度的国家太阳能计划败诉之举显示了如何将晦涩难懂的贸易规则用以影响那些支持清洁能源和地方就业的政府。巴黎气候协定的墨迹还未干，不过显然贸易依旧压倒了就气候变化采取的真正行动。”⁵⁵ 这个范例展示了对国家监管空间采取支持商业的做法以及一贯反对国家制定工业政策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错误所在。⁵⁶ 联合国需要开展一项运动，将人权纳入世贸组织工作的主流，并为争端解决小组建立明确的准则，以期给予人权、健康和环境关切应有的重视。

八. 贸易与促进人权

73. 联合国是一个卓越的国际组织，各国应当确保其有权协调所有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或者至少防止它们阻挠《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实现。目前，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等其他组织以及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一反常态地在设定世界议程方面与联合国出现了竞争，并且对数十亿妇女、男子、儿童和老年人享有人权的状况产生了不利影响。必须更大力地实施协调，而不是开展这种机构竞争。二十一世纪不能任由多个世界组织引领国际秩序走向不同且往往相反的方向。国际投资制度不是一种“独立于世”的法律制度；它必须与《联合国宪章》和各项国际人权条约保持一致。所谓的“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并不意味着彼此冲突的法律制度可以同时发挥作用，也不意味着冲突应当由三名私人仲裁员解决。人权极为重要，不可从属于重商主义。⁵⁷ 一旦发生冲突，只有最高级别的公共法院能够依据国际法整体作出裁决。除非经各个会员国修正，否则《联合国宪章》依然是决定国际秩序结构和运作的首要条约。

74.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所有条约必须遵守《宪章》。如果贸易协定和世贸组织指令的某些部分阻碍了《宪章》宗旨和原则(包括人权和发展)的实现，那么必须对它们进行修订。这就必须认识到，人权不是贸易的障碍，但是贸易不得严重影响人权的实现。

75. 拒绝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和《服务贸易协定》并不会产生世界末日般的后果，不会致使世界贸易陷入停滞，也不会阻碍直接外资的流动。自此以后，贸易

⁵⁵ 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5668342。

⁵⁶ Robert Wade, “The role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见贸发会议, 《全球金融危机后对发展战略的重新思考》, 第一卷, 第 67 至 80 页; José Salazar-Xirinachs, Irmgard Nübler and Richard Kozul-Wright (eds.), *Transforming Economies: Making industrial policy work for growth, jobs and development* (Geneva, ILO, 2014)。

⁵⁷ Juan Hernández Zubizarreta and Pedro Ramiro, *Contra la lex mercatoria* (Barcelona, Icaria editorial, 2015)。

必须造福于社会全体，而不仅仅是跨国公司。客观而言，没有必要签署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些协定迄今一直是为少数人带来利益而给多数人造成损害。公司接管国家职能，这颠覆了国家的宪法秩序，并导致无法履行各项人权条约义务。世界经济在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出现之前当然并非不利于商业，而且它还通过一种健康的贸易发展实现了繁荣。

76. 因此，辩论点不在于“自由贸易”是否应当存在。负责任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不容置疑。提高关税或重回没有商业交换的自给自足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可供选择的并不是“万事皆可”或极权主义。良知未泯并受道德约束的贸易能促进发展，同时尊重透明度和问责制。这也提醒各国政府、议会和法院有责任采取行动以实现大会 1974 年 5 月 1 日 S-6/3201 号决议所指的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九. 以条约规定《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约束力

77. 《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民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不能通过放松对贸易、市场和金融服务的管制来实现。一方面，企业应受保护，以免遭腐败的国家政府和任意的征用行为之害，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也需保护，以免受投资者、投机者和跨国公司贿赂和贪污行为之害。个人和人民都应当获得保护和救济，以免遭受公司滥用权利、掠夺土地和剥削。

78. 观察员长久以来一直在指责如下不正常的现象，即：工商企业保障了自己的投资享有特权保护，并且设立了私人化的仲裁庭以推行其对“法律”的意见，然而却没有一个法庭可以保护国家政府不受工商业滥用权利之害，也无从保护个人受害者免遭工商业活动的不利后果。这种规范上的不对称必须矫正。

79. 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通过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执行机制。这降低了正在继续通过“意见”、宣言和决议的联合国各机构的公信力，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对这些“意见”、宣言和决议视若无睹。世贸组织有针对贸易和其他协定的执行机制以及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不过还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为人权条约创设这些机制。对于《联合国全球契约》和《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承诺尚未实现，就是因为自律监管从未发挥作用。

80. 投资者和公司承担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必须纳入贸易和投资协定，而且公共法院必须具备管辖权以审查各种违背义务的行为，并对违反者施加制裁。尽管《指导原则》是以硬法为基础，但是违背行为仍然不受处罚，例如，侵犯国家监管空间的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如此。条约应当规定其自身的监测和执行机构，或者被纳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作为任择议定书，同时规定各项裁决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如美洲人权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各国必须针对商业活动对人权的影响颁布民

事和刑事立法；应当援引国家责任学说以规定滥用权利行为在企业经营或登记的地方具有可审理性。

81. 2014 年 6 月，人权理事会通过了关于设立一个政府间工作组负责起草这样一项文书的第 26/9 号决议。⁵⁸ 2015 年 7 月，该工作组第一届会议在日内瓦举行；⁵⁹ 其第二届会议计划于 2016 年 10 月举行，所有国家和民间社会应当给予支持。工商业与人权论坛⁶⁰ 推动了这一进程。

82. 在条约之外，迫切需要加强国内和国际刑法，包括反托拉斯立法，以处理贪污、欺诈、贿赂⁶¹、洗钱、共谋、串通共谋、逃税、内幕交易、抢掠养老金和肆意危害生命和环境案件。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可以推动这一进程。《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也与之相关，因为采矿企业、包括开采黄金、钻石和钶钽铁矿石⁶² 的企业某些活动以及象牙贸易⁶³ 均涉及刑法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83. 关于公司法律责任的条约不应止步于对跨国公司民事责任的界定。当公司的行动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时，以及当它们毁坏地貌景观和人类共同遗产时，公司必须承担刑事责任。事实上，石油、天然气和采矿企业的某些活动对环境构成了重大攻击，同时肆无忌惮地危及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种攻击不仅仅是由法人实施的，也是由公司董事会的个人实施的，完全可以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第(一)款第 11 项将其作为危害人类罪加以审理。当工商业活动造成人口的非自愿流离失所时，可使用第七条第(一)款第 4 项。纽伦堡审判展现了对 I.G.法本公司、弗利克公司和克虏伯公司业务主管起诉和定罪的方式，因为他们是纳粹罪行的共犯。1946 年，负责生产齐克隆 B 的业务主管布鲁诺·特希被审判并定罪。如今，制造地雷、集束炸弹、贫铀弹药和白光荧光粉等滥杀滥伤武器的企业的刑事责任可以且必须在国际刑事法院提出。业务主管没有理由享受豁免。普遍管辖权应当在适当的案件中得到检验。

84. 迄今为止，公司滥用权利行为的受害者仍然得不到充分的资源或救济。这对人权理事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仅需要进行判断，还需要提出具体建议和可

⁵⁸ <http://business-humanrights.org/en/binding-treaty/un-human-rights-council-sessions>。

⁵⁹ Kinda Mohamadieh and Daniel Uribe,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South Bulletin*, vols. 87-88, 23 November 2015. 2015 年 9 月 25 日，方济各在大会中说：“我们必须躲避任何可能导致我们陷于一种可以宽慰我们的良心的宣言主义者唯名论的诱惑。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制度真正有效，与所有这些灾祸进行斗争”，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speeches/2015/september/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925_onu-visita.html。

⁶⁰ www.ohchr.org/EN/Issues/Business/Forum/Pages/ForumonBusinessandHumanRights.aspx。

⁶¹ www.theage.com.au/interactive/2016/the-bribe-factory/day-1/the-company-that-bribed-the-world.html。

⁶² www.congoweeek.org/en/coltan-facts.html。

⁶³ <http://iworry.org/crisis/?gclid=CONuwKXxks0CFVlaGwod6hMH2g>。

执行的解决办法。必须加强人权执法制度，以遏制普遍存在的公司有罪不罚这种体系架构。

十. 预防性和纠正性行动

85. 独立专家支持杰罗尼莫·卡帕尔多、⁶⁴ 诺姆·乔姆斯基、⁶⁵ 迈克尔·赫德森、⁶⁶ 黛博拉·詹姆斯、⁶⁷ 乔治·卡哈勒、⁶⁸ 理查德·科佐一赖特、⁶⁹ 伊莎贝尔·奥尔蒂斯、⁷⁰ 马克斯·奥特、⁷¹ 劳厄·波尔森、⁷² 杰弗里·萨克斯、⁷³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⁷⁴ 加斯·范·哈滕⁷⁵ 和罗伯特·韦德⁷⁶ 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的分析，同时依据其他报告员和工作组的研究，认为目前亟需要求人权理事会采取行动，以防止他们的良好建议因公司一句“那又怎样？”而变得

⁶⁴ https://stopttipitalia.files.wordpress.com/2014/02/capaldottip_rejoinder.pdf。

⁶⁵ Noam Chomsky, *Who Rules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2016); www.youtube.com/watch?v=P2lsEVLqts0。

⁶⁶ www.counterpunch.org/2016/05/11/the-dangers-of-free-trade-agreements-ttips-threat-to-europes-elderly; Michael Hudson, *Killing the Host* (Petrolia, Counterpunch Books, 2015)。

⁶⁷ www.globalexchange.org/events/speaker/deborah-james。

⁶⁸ Douglas Thomson, “Kahale calls for overhaul of BIT system”, *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 Vol. 9, No. 3 (11 April 2014); www.chambersandpartners.com/global/person/50001/george-kahale-iii。

⁶⁹ www.euractiv.com/section/trade-society/news/un-blasts-eu-for-backing-global-deal-for-isds-but-not-for-country-bailouts/。

⁷⁰ www.ilo.org/newyork/events-and-meetings/WCMS_237980/lang--en/index.htm; www.ilo.org/global/docs/WCMS_214366/lang--en/index.htm。

⁷¹ www.youtube.com/watch?v=P_FBJYZBWH0。马克斯·奥特称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彻底卸去了政治的权力”。

⁷² 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60380/bis-13-1284-costs-and-benefits-of-an-eu-usa-investment-protection-treaty.pdf; www.rowmaninternational.com/books/rule-makers-or-rule-takers。

⁷³ 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rofessionals-network/2015/mar/24/could-the-ttip-trade-deal-undo-development-gains; www.huffingtonpost.com/roger-hickey/economist-jeffrey-sachs-s_b_5823918.html。

⁷⁴ Joseph Stiglitz, *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W.W. Norton, 2015); *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 (New York, W.W. Norton, 2015)。

⁷⁵ <http://thetyee.ca/Opinion/2016/01/18/TPP-Foreign-Investors/>; <http://thetyee.ca/Opinion/2013/11/12/Harper-Gives-Up-Sovereignty/>。

⁷⁶ Robert Wade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arguments, evidence, and economists”,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John Ravenhill,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Current thinking about global trade polic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9, No. 6. (8 Feb. 2014); “‘Market versus State’ or ‘market with State’: how to impart directional thrus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5, No. 4 (July 2014)。

无足轻重。跨国公司已经成了一类必须加以驯服的海怪。事实上，任何行使权力(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权力)的行为，只要影响到人们的生命，都必须服从民主管制，并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秉承这样一种精神，提出建议如下。

针对国家

86. 国家应当暂停执行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裁决，直至整个制度经过国际法院检验。新的多边条约应当规定，法院在未证实此类裁决符合人权条约义务和公共秩序的情况下，不得执行这些裁决。

87. 国家应当避免缔结新的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以及《服务贸易协定》，除非已经开展了人权、健康和环境影响评估，并且实行了充分披露、利益攸关方协商和公共参与。如有可能，应当进行公民投票。

88. 国家应当检验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各项规定、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和投资法院制度机制，以及世贸组织规则和惯例的合法性，以遵守本国宪法和本国的人权条约义务。

89. 国家可以考虑援引人权事务委员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十一条)和区域人权法院的国家间程序。欧洲国家应当在欧洲人权法院检验《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是否符合它们的人权义务。美洲国家应当检验各项贸易协定是否符合《美洲人权公约》。非洲国家应当检验与《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的一致性。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应当在欧洲法院检验各项贸易协定的合宪性。⁷⁷

90. 国家应当针对现有的贸易协定开展事后的人权、健康和环境影响评估，并在必要时修改这些协定。

91. 国家应当与政府间工作组合作起草一项关于公司的社会责任的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并尽快通过该条约。该条约应当赋予《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效力，并规定监测和执行机制。该条约应当向跨国公司滥用权利活动的受害者提供追索权和救济。

92. 国家应当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 17.10 的设想，执行《多哈发展议程》。在《多哈发展议程》的各项承诺兑现之前，不得履行《贸易便利化协定》。

⁷⁷ 2016 年 5 月 4 日，欧洲法院面对英美烟草公司和菲利普·莫里斯的质疑，维持了 2014 年烟草产品指令，<http://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6-05/cp160048en.pdf?version=meter+at+null&module=meter-Links&pgtype=article&contentId=&mediaId=&referrer=https%3A%2F%2Fwww.google.ch%2F&priority=true&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meter-links-click>。

针对议会

93. 议会在没有行使监督职能并根据各项影响评估审查贸易协定与人权条约义务相符性的情况下，不得批准贸易协定。

94. 议会应当规定，条约谈判人员同意在投资条约中规定反民主锁定期的行为违法。⁷⁸ 未经民主辩论而对现行法案增加附文的行为不可接受。

95. 议会应当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提出的相关修订和终止程序，修改商业条约和废除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

96. 议会和议联应当加强它们与世贸组织在人权、健康和环境领域的合作。

针对国内法院

97. 国内法院和法庭只有在根据人权条约义务审查外国仲裁裁决的合法性之后，才能执行这些裁决。对于侵犯国家监管空间的仲裁裁决，应当以违背国内和国际公共秩序为由予以拒绝。应当系统地使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纽约]公约》第五条所载公共政策例外，以防止国家基本职能受到干预。

针对国际法院

98. 国际法院应当在适当的争议性案件中或者在咨询意见中就国家遵守人权条约制度的普遍性义务表态。贸易协定、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或投资法院制度均不得阻碍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联合国宪章》的至上条款(第一百零三条)以及善意原则、禁止条约违反善良风俗原则和禁止滥用权利原则等一般法律原则，效力优先于与之冲突的贸易协定和仲裁裁决。

针对世界贸易组织

99. 世贸组织应当将人权纳入其所有活动的主流，并向各争端解决小组发布指令，以免违反人权条约行为的处理受到不利影响。

100. 世贸组织争端小组应当对《1994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所载例外情况作出解释，以支持粮食安全、健康和环境方面的各项举措，并便利气候变化的解决办法。世贸组织应当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人权高专办开展政策协调工作。

⁷⁸ 如果考虑到最低期限加上存续条款，投资条约中的锁定期通常为 10 年至 30 年不等。独立专家未听说其他条约有这么长的锁定期可以阻碍未来当选的政府重新探讨这些条约。民主政府永远不得一代又一代地受到此类条约约束。

针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101. 贸发会议应当召集一次世界会议，修订现有的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废除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并宣布投资法院制度不符合联合国的根本性法律。

针对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

102. 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协助开展人权、健康和环境影响评估。它们应当传播关于商业条约及其人权影响的信息，并要求举行公民投票。

针对人权理事会

103. 人权理事会应当成为各国政府竞相展示如何最有效地落实人权、如何加强法治以及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国际舞台。人权方面成绩的竞争是最好的竞争。人权理事会应当成为一个卓越的论坛，各国政府可以在这里阐明其善意履行各项保证、扩大解释人权条约以及纳入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最佳做法。人权理事会不得成为一个政治化的场所，各国在这里将人权用作武器打败它们的政治对手，人权被弱化作为一种“余兴表演”或“时下潮流”，或者点单式地适用国际法。

十一. 后记

104. 独立专家支持劳伦斯·萨默斯最近在《金融时报》上作出的评论：“促进全球一体化可以成为一个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项目……这将意味着从国际贸易协定转向国际协调协定，在后者之中，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将优先于增强外国制造商权能的相关问题。”⁷⁹

105. 特别程序的公信力部分取决于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建议的执行情况，而他们的报告仅仅经过简单讨论就被归档，然后被抛诸脑后。在制定特别程序之时，各国当然并非意在召集一次预言者大会，尔后系统性地忽视这些预言者的发现和警告。我们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面前的道德晕眩不应导致意识麻痹，而应激发强有力的措施。应当建立一个资金适足的后续机制，用以监测和校准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得到审议的范围。应当确定后续行动特别报告员的授权任务。普遍定期审议程序和人权高专办咨询服务可以进一步协助执行工作。

106. 最后，独立专家再次对人权高专办忠诚、努力且称职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并请人权理事会和大会确保大为增加为人权高专办分配的资源。

⁷⁹ www.ft.com/cms/s/2/5e9f4a5e-ff09-11e5-99cb-83242733f755.html#axzz4C6q6RIgt。

Annex I

Activities of the Independent Expert since the last report

- Participation at side-events during the 30th, 31st and 32nd sessions of the HR Council and side-events during UPR sessions.
- 20 July: Lecture on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human rights, University of Jaén.
- 25 September: Lecture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 in UN monitoring bodies, University of Leiden.
- 30 September: WTO Public Forum, Geneva.
- 13 October: Expert Consultation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Human Rights, Geneva.
- 15 October: Lecture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Bi-laterals with European Commission representatives to discuss the proposed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Brussels.
- 5 November: Lecture on “The UN’s contribution to democracy” at the Leuven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 27-28 January: Lecture at the conference “Strategy meeting on catalysing reform of trade negotiation processes”, organized by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Brussels.
- February-March: Bilateral consultations with South Centre, Geneva.
- 19 April: Keynote speaker at 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 28 April: Conference on CETA and TTIP organized by Food Watch, Paris.
- 12 May: Bilateral consultations with WTO secretariat, Geneva.
- 23 May: Bilateral consultations with Lelio Basso Foundation, Geneva.
- 26 May: Bilateral consultations with IPU trade expert, Geneva.
- 2-3 June: CETIM conference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Barcelona.
- 6-10 June: Annual meeting of Special Procedures, Geneva.
- 10 June: Working lunch on UN Reporting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Politics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Geneva.
- 13-14 June: Annual Session of the Parliamentary Conference on the WTO organized jointly by the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Geneva.
- 22 June: Keynote speaker at a meeting on trade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ed by the NGO Committee on Development, Geneva.
- 3-4 July: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rganized by the Lelio and Lisli Basso ISSOCO Foundation, Rome.

Annex II

Excerpt of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G-77 High- 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South. The Future Architectur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held in Bangkok, Thailand, 9-10 March 2016

In this context, Investor-State-dispute settlement (ISDS) arbitration agreements should be rejected and those currently in existence should be abolished, because ISDS is incompatible with international ordre public and its mere existence has led to a dangerous “regulatory chill” and consequent vio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y regime. The ontological function of States is to legislate and regulat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reaffirms that all suits at law (including investment disputes) must be adjudicated by independent tribunals that respect the 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Creation of a privatized system of dispute settlemen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obligations under the ICCP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Private arbitrators cannot replace the system of public justice, which is an achieve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nnex III

Questionnaire of the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promotion of a democratic and equit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on the impact of WTO agreements, rules and practice on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food security

Brief responses are welcome (e.g. in bullet points) and are not required for all questions.

This questionnaire is addressed to member and observer State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he identity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should they so wish, will remain confidential (only the country where they operate may be disclosed).

Priorities of the WTO

1. Some countries, particularly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proposing to introduce “new issues” into the WTO agenda, including investment, competition policy,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e-commerce, along the lines that have been shaped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or which are shaping up in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There is, however, a pending agenda to be addressed — including issues of agriculture reform (e.g. removal of developed country subsidies e.g. cotton), the strengthening of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flexibil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have more policy space for industrialization etc. What should be the WTO’s priorities and why?
2. What measures, if any, are envisaged or have been adopted to mainstream human rights into all WTO activities, including guidelines for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anels? How can WTO ensure that the human rights treaty obligations of WTO member States are not compromised by WTO rules and that the human rights treaty regime is always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elaborating, negotiating, adopting or implementing WTO policy, agreements and rules.

Impact Assessments and other measures

3. Please provide examples of how measures, such as opinion polling, consultation of all stakeholders, human rights,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have been used prior to the adoption of past WTO rules and recommendations, and how these mechanisms may be effectively employed in current negotiations.
4.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food, Olivier de Schutter, proposed that the WTO Secretariat should, “Maintain and deepen the existing constructive dialogue with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Encourage WTO members to conduct human rights impact assessments prior to the conclusion of trade agreements or to accepting new schedules of commitments”. To what extent have his recommendations been implemented?^a

^a http://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10/5/Add.2.

Negotiation, rat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5. How and to what extent can all stakeholders participate in the negotiation, rat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TO agreements, for example the TRIPs Agreement, to ensure that ecosystems are preserved and human rights are respected, protected and fulfilled in this regard, and that food security and access to generic drugs are promoted and not delayed or undermined. Please include best practic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meaningful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se processes.

6. Numerous Stat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have criticized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inclusiveness during the WTO Nairobi Ministerial Conference. What procedures should be put in place so that Ministerial Conferences do not end up presenting what is effectively an ultimatum text at the final hour with no opportunity for the majority of delegations to negotiate but merely an option to give an up or down vote? How can the negotiating texts be responsive to the concerns of the majority of WTO Members and not just the powerful?

7. The WTO Doha Round remains on-going as there was no consensus to close it in Nairobi. Heads of States at the 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agreed to “promote a universal, rules-based, open, non-discriminatory and equitabl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und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cluding through the conclusion of negotiations under its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target 17.10).^b Is your government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If not, why not?

Conflict of laws

8. Bearing in mind that the UN Charter is akin to a world constitution, and that Article 103 of the Charter is effectively a supremacy clause, any conflict with other treaties must give precedence to the UN Charter. However, WTO law operates outside the UN system. There is therefore an incoherenc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so that WTO rules are fully compatible with UN constitutional law. Would your government support the primacy of human rights law over trade agreements? How can WTO ensure that State measures take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employment, food security, enjoyment of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rights,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not delayed or undermined by trade “imperatives”. Should this issue of priorities be rai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or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y advisory opinion?

9. Please explain what are the pros and cons of incorporating WTO into the UN family and making it work in tandem with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 (Articles 57 and 63, UN Charter)?

Dispute Resolution

10. A WTO Panel recently ruled that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s maintained by India for solar cells and modules violate India’s national treatment obligations under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1994 and the WTO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 This decision marks the first time that a WTO Member has sought to justify a departure from WTO practice by reference to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on climate change. The argument was rejected by the WTO panel, although India invoked

^b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opic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its treaty obliga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xception provided for in GATT Article XX (d). This raises an issue of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oes your country have local content policies? If yes, please give an example. The WTO’s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 prohibits the use of local content policies in goods. Has this been an impediment to your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ies or to the promotion of local employment?

11. What are the pros and cons of creating a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within WTO competence to examin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WTO agreements, rules and regulations?

12. What other recourse and remedies would be available to States, corporation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including indigenous peoples, in a situation where human rights are violat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WTO agreement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Would a petitions mechanism assist in reaching friendly settlement?

Annex IV

WTO Secretariat replies to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promotion of a democratic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riorities of the WTO

Question 1

- When WTO Members adopted the Nairobi Ministerial declaration^a by consensus on 19 December 2015, they set the priorities for the WTO. Th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recognizes that differences do exist on the way forward and recognizes that “Many Members want to carry out the work on the basis of the Doha structure, while some want to explore new architectures” (parag. 32 of th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 The Declaration highlight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its paragraph 34, when it says that “any decision to launch negotiations multilaterally on such issues would need to be agreed by all Members.
- In Paragraph 34 also, our Members have tasked officials to work towards finding ways to advance negotiations and requested the Director-General to report regularly to the General Council on these efforts.

Question 2

- WTO Members have never discussed nor adopted any specific measures to mainstream human rights into WTO activities, including in relation to dispute settlement.
- However, WTO rules do not prevent governments from implementing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 The WTO recognizes the benefi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one of its goals. WTO agreements include sufficient policy space to allow governments to pursue legitimate objectives other than trade, including human rights.

Impact Assessments and other measures

Question 3

- All WTO bodies serve as a forum for Members to discuss specific issues and share experiences on trade and trade-related matters.
- WTO Member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se committees often request WTO Secretariat to produce analysis and factual reports on specific issues pertinent to the work of these committees.
- Given the member-driven na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s are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each individual member of the WTO; For information

^a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c10_e/mindecision_e.htm.

purposes, the WTO Secretariat reaches out to all stakeholders through the WTO Public Forum or activities in several reg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Question 4

- The WTO Secretariat engages actively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also participates in numerous joint initiatives.
-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food crisis in 2008,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established the High Level Task Force on Global Food Security Crisis (HLTF) involving more than 2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 towards a coordinated and synergic response to the crisis. The WTO Secretariat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HLTF deliberations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contributed very actively to the formulation of the joint policy framework (called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f Action) to assist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dealing with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challenge.
- Specifically on the issue of Right to Food, the Framework advise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be guided by the “Voluntary guidelines to support the progressive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ecurity”^c adopted by governments at the FAO Council in 2004.
- The WTO Secretariat also contributes to and participates in other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support global food security including i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G20 and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CFS).
- In the WTO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a number of observ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regularly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A meetings. The CoA undertakes annually a dedicated discussion on food security-related aspects relevant to LDCs and net food-impo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the domain of food security (like the FAO, WFP) are specifically invited to contribute to that debate.
- The long-term objective of the WTO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is to establish a fair and market-oriented trading system through a programme of fundamental reform. The agricultural reform programme is furthered through the negotiations. The negotiations on agriculture take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Special Sess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and are based on WTO Members’ contributions and proposals.

Negotiation, rat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Question 5

- The WTO TRIPS Agreement was consciously crafted and carefully negotiated to safeguard policy space, particularly in the vital area of public health.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multilateral treaty, it expressly articulated the role of the IP system as a policy tool intended to advance broader public policy objectives: it stated that the IP

^b Both the WTO and 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are represented on the Task Force.

^c The guidelines recognize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food and advises them on a repertory of actions consistent with their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The agricultural reform programme launched under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is specifically acknowledged in the Guidelines as a contributory factor to strengthen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the progressive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food.

system should promote bo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fer and dissem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at this should work for the mutual advantage of producers and users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s well as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welfare and a balanc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WTO Members implementing the Agreement has since borne out the breadth of the scope for public health policies that the TRIPS Agreement supports, both for diverse forms of innovation and for measures to leverage access to the fruits of innovation such as new medicines, as well as safeguards against abuse of IP rights.
- A major step towards policy coherence for public health for the WTO was the subsequent adoption of the Doha 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 of December 2001 ('the Doha Declaration'). The Doha Declaration situated a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squarely within a public health context, stating that the TRIPS Agreement had to be part of wide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tion to address public health problems. The Declaration has helped catalyse cooperation across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to promote a more coherent and inclusive approach to innovation and access to medicines, as reflected most recently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arget 3.b).
- The Doha Declaration led, on the initiative of the African Group, to a consensus among WTO Members in 2005 to establish a formal amendment to the TRIPS Agreement that would remove a potential legal obstacle for countries most dependent on imports to meet their needs for affordable medicines. This was the first agreement to amend the entire package of WTO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nd it was entirely geared to ensure access to medicines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 The Doha Declaration is also at the origin of an extended transition period for least developed country WTO Members that exempts them from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and enforce patents for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as well as undisclosed test data that are submitted 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marketing approval. In 2015, the LDC Group took the leadership in negotiations with all other WTO Members that ultimately led to a consensus decision to further extend the transition period until January 2033. This second extension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is an example of the all-inclusiveness of the negotiating process at the WTO. It aims at facilitating access to affordable medicines and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an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the SDG goals.
- The effect of the Doha Declaration as a catalyst for cohere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was seen in its role of making public health issues a central focus of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WTO on IP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its inclusion in a series of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resolutions on ensuring accessibility to essential medicines and public health, innovation and IP, in its use as a point of reference in the negotiations on the WHO Global Strategy and Plan of Action on Public Health,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GSPA-PHI), and in identifying health-related flexibilities that have been dealt with under the WIPO Development Agenda, as well as in a number of important declarations and resolutions adopted by other UN bodies (e.g. UN ECOSOC High-Level Segment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Implementing the internationally agreed goals and commitments in regard to global public health, 2009; UN Political Declaration on HIV and AIDS: Intensifying our efforts to eliminate HIV and AIDS, 2011).
- Exemplifying this coherent and inclusive approach, an active program of coordinated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policy dialogue, led at Director General level and centred on public health imperatives, has unfolded in the form of a trilateral

initiative undertaken by the WHO, WIPO and WTO. Reaching well beyond the three specialised agencies, this program has drawn widely on diverse policy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to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of policy insights and empirical data so as to illuminate the pathway to more coherent outcomes and to build capac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take informed policy choices according to national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This policy dialogue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has long been consciously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to include a wide spectrum of voices from civil society, the not for profit and philanthropic sector, diverse industry players,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and expert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including UNCTAD, UNAIDS and UNDP.

- With respect to food security, there seem to be numerous concerns about the right to food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fear is that farmers will get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new plant varieties that are protected by IPRs and that in time this would lead to a reduction in agro-biodiversity. To the extent they concern IP protection, the TRIPS Agreement already accommodates them in significant respects through the policy space it leaves to countries. Under Article 27.3 (b) countries are not required to provide patent protection for inventions of (i) plants and animals and (ii) essentially biological processes for their production. Where Members do not provide patent protection for new plant varieties, they are required to protect plant varieties through an effective *sui generis* system (i.e. a system created especially for this purpose). Members also have the option of using a combination of both systems of protection, namely TRIPS provisions on patents and a *sui generis* system. There is no further explicit guidance in the TRIPS Agreement as to what is to be considered an effective *sui generis* system. These provision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TRIPS Council. For, example, when the delegation of the US put forward what it considered to be an 'effective' system, this was countered by the Indian delegation. There was also a vigorous debate on whether or not TRIPS requires Members to comply with UPOV 1991, with no conclusion drawn. (See Summary prepared by the WTO Secretariat in WTO document IP/C/W/369/Rev.1, 9 March 2006, 16-20 and 20-24.) Further, Article 27.2 allows WTO Members to exclude from patentability inventions whos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they find necessary to prevent to protect human, animal or plant life or health or to avoid serious prejudice to the environment. This provision could be used, for example, to exclude GM crops, provided the member also prevents th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such products in its territory.

Question 6

- The Nairobi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was adopted by consensus and incorporates a number of decisions such as on Agriculture (Export Competition, Special Safeguard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Country Members; Public Stockholding for Food Security Purposes), Cotton and LDC issues (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 fo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mplementation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 in Favour of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of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creasing LDC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s Trade).
- It reiterates the importance of LDCs, Small and Vulnerable Economies (SVEs) and Art. 12 Members ... and pledges to work towards keeping Development at the heart of the negotiations.
- Part III of the Declaration clearly reflects the different views that WTO Members have on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organization.

- That being said, the Director-General and some members have stressed that “the preparatory process for Ministerial Conferences can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maintain transparency and inclusivity throughout the process”.^d

Question 7

- This question seems to be addressed to governments and not to the WTO Secretariat.

International law

Question 8

- The WTO regularly associates itself with the objectiv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UN such as the MDGs and now the SDGs; it contributes actively to work of ECOSOC work as well as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The WTO is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UNCEB and its subsidiary bodies, and works closely with numerous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such as UNCTAD, ILO, FAO, WIPO and WHO. The WTO also has a coherence mandate with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 However, the decision for the WTO to be an independent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as taken unanimously by its founding members in 1995. Only WTO members are in a position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in relation to that decision, and subsequently, its effect and resulting functioning.

Dispute Resolution

Question 9

-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pplies to disputes between WTO Members regarding Member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WTO agreements. It does not provide panels or the Appellate Body with jurisdiction to decide on violations of non-WTO agreements.
- So far, no WTO Member has ever made an allegation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WTO rules has led to a violation of a Member’s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 WTO rules leave sufficient policy space for governments to be able to respect and implement at the same time both their WTO obligations and their human rights commitments.

Question 10

-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may pursue their claims before domestic courts.
- Disputes between two States involving an alleged violation of a human rights treaty may be brought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r other specific adjudicatory bodies designated by the parties.
- It has been made clear in several trade disputes adjudicated under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at governments are entitled to prioritiz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ver their trade obligations.

^d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6_e/hod_10feb16_e.htm.

- The GATT permits WTO Members to impose export restrictions to prevent or relieve critical shortages of foodstuffs.
- We are not aware of a single alleg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human rights are violated as a result of the application of WTO agreements.
- The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CTE) provides a forum where WTO Members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concerns and best practices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 It has contributed to ident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iple win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 Members of the CTE are also regularly briefed by specialized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s on topical subjects in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trade and environment.
- In recent years,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CTE including: efforts to combat illegal logging; sustainability labelling schemes; carbon foot-print methodologies; renewable energy initiatives.

Annex V

2016 Annual Session of the Parliamentary Conference on the WTO — Outcome Document, June 2016

We appreciate the decision on public stockholding for food security purposes and call for the conclusion of negotiations on finding a permanent solution to the issue, in keeping with the decision. We believe that the issue of food security is vita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at WTO rules must support efforts to combat hunger. In line with the same decision, we also want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a speedy adoption of a proposal for a Special Safeguard Mechanism, in conformity with the Nairobi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he issue.

We urge WTO Members to capitalize on the momentum created by recent progress, bearing in mind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of strengthen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the need to consolidate the WTO as the centre of trade negotiation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recognizing that new approaches will be necessary. Flexibility,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will be key to advancing on all the remaining issues of the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DDA). Since the Doha Round was launched in 2001, the world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technological terms. New challenges such as e-commerce, digit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an also be discussed without prejudice to outstanding issues of the DDA.

Annex VI

Selected Bibliography

- Yilmaz Akyüz,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inance and Changing Vulnerabilities in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South Centre, Geneva, 2015.
- Wolfgang Alschner, “Regionalism and Overlap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 Towards Consolidation or Contradi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7(2): 271-298, 2014.
- Jose Alvarez,
 - *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Oxford, 2011.
 - *The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Martinus Nijhof, Leiden 2011.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aw-Makers*, Oxford, 2005.
- Jose Alvarez, Karl P. Sauvant, Kamil Girard Ahmed and Gabriela P. Vizcaino (eds.). *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Expectations, Realities, Op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Todd Allee and Clint Peinhardt. “Delegating Difference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Bargaining over Dispute Resolution Provis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4 (1): 1-26, 2010.
- Todd Allee, and Clint Peinhardt. “Contingent Credibility: The Impact of Investment Treaty violation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5 (3): 401-432, 2011.
- Aviva, *A Roadmap for Sustainable Capital Markets: How can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arness the global capital markets?* London, 2015.
- Gonzalo Berrón and Brid Brennan, *International Peoples Treaty on the Control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Base Document for Global Consultation, 2014.
- Juan Pablo Bohoslavsky and Horacio Verbitsky, *Cuentas Pendientes*, Siglo XXI Editores, 2013.
- Francis Boyle, *World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Alfredo Calcagno, “Rethin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UNCTAD, *Rethin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Vol. I, pp. 9-26.
- Amélie Canonne avec Johan Tyszler et Lucile Falguyrac, *Le TAFTA avant l’Heure*, Tout comprendre au traité UE-Canada,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techniciens, experts et chercheurs, Montreuil, 2016.
- Carska-Sheppard, Andrea. “Issues Relevant to the Termina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6(6): 755, 2009.
- Noam Chomsky, *Who rules the world?* Penguin, 2016.
- Natasha Cingtotti, Pie Eberhardt, Nelly Grotenfeldt, Celia Olivet and Scott Sinclair,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put to the test*,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Friends of the Earth Europe, Brussels, 2016.

-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 Profiting from Injustice, Brussels, 2012.
 - Profiting from Crisis, Brussels, 2014.
 - Le dangereux duo réglementaire. Comment la coopération réglementaire transatlantique sous le TTIP permettra à l'administration et aux grands entreprises de s'en prendre aux intérêts publics, 2016.
 - The Zombie ISDS, Rebranded as ICS, rights for Corporations to sue States refuse to die. Brussels, 2016.
- Carlos Correa,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xford 2007.
- Lorenzo Cotula. "Do Investment Treaties Unduly Constrain Regulatory Space?" Qu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9: 19-31, 2014.
- David Cronin, Corporate Europe. How Big Business Sets Policies on Food, Climate and War, Pluto Press, London, 2013.
- Zach Elkins, Andrew T. Guzman and Beth Simmons. "Competing for Capital: The Diffus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1960-200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0:4: 811-846, 2006.
- Gabriel Felbermayr, Rahel Aichele, How to make TTIP inclusive for all? Global Economic Dynamics, Bertelsmann Stiftung, Leibniz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Munich, 2015.
- Jean Feyder, La Faim tue, Préface Jean-Claude Juncker, L'Harmattan, Original title: *Mordshunger*, Westend Verlag, 2010.
- Susan Franck,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 Fordham Law Review 73(4): 1521-1625, 2005.
- Baltasar Garzón,
 - La Fuerza de la Razón, Editorial Debate, 2012.
 - "Jurisdicción universal" <http://baltasargarzon.org/jurisdiccion-universal/>.
- Andrew Guzman,
 - "Why LDCs Sign Treaties that Hurt Them: Explaining the Popularity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8: 639-688, 1998.
 - "Against Consent".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2(4): 747-790, 2011.
- Yoram Haftel, and Alexander Thompson. "Delayed ratification: the domestic fate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7 (2): 355-387, 2013.
- Juan Hernandez Zubizarreta, The new global corporate Law,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2015.
- Juan Hernandez Zubizarreta y Pedro Ramiro, Contra la Lex Mercatoria, Icaria, 2015.
- Sarah Joseph, Blame it on the WTO? A Human Rights Critique, Oxford, 2011.
- D. Kinley, J.M., Waincymer, (ed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09.

- Margie-Lys Jaime. “Relying on Parties’ Interpretation in Treaty-Based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Filling the Gap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6: 261-313, 2014.
- Srividya Jandhyala, J. Witold, J. Henisz and E. Mansfield. “Three Waves of BITs: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5 (6): 1047-1073, 2011.
- Daniel Stedman Jones,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Hayet,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Jeff King, *The Doctrine of Odious Debt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2016.
-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Knopf, Canada, 2007.
- Jürgen Kurtz, “Australia’s Rejection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Causation, Omission and Implication.” *ICSID Review* 27(1): 65-86, 2012.
- Federico Lavopa, Lucas Barreiros, and Victoria Bruno. “How to Kill a BIT and Not Die Trying: Leg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of Denouncing or Renegotiating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6 (4): 869-891, 2013.
- J. Aloysius Llamzon, *Corrup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Oxford 2014.
- George Monbiot, *How did we get into this mess?* Verso 2016.
- Jane Mayer, *Dark Money*, Doubleday, New York, 2016.
- Joyce Naar, *Samenwerking in wederzijds belang en onderlinge afhankelijkheid : een beschrijving en analyse van de ACP-EG-partnerschapsovereenkomst (A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CP-EU-Partnership-agreement.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mutual interest and in the spirit of interdependence)*, 2002.
- Steve Peers, Tamara Hervey, Jeff Kenner, Angela Ward, *The EU Charter on Human Rights*.
-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4.
- J. Pohl, K. Mashigo and A. Nohen. *Dispute Settlement Provis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 Large Sample Survey*,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012/02. <http://dx.doi.org/10.1787/5k8xb71nf628-en>.
- Pope Francis,
 - Encyclical Letter *Amoris Laetitia* — (on the family), Rome, 2016.
 - *Laudato Si* (on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Rome, 2015.
- Lauge Poulsen,
 -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the Diffusion of Modern Investment Trea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8: 1-14, 2014.
 -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Economic Diplomacy: The Politics of Investment Trea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Sacrificing Sovereignty by Chance*, Ph.D. Dissertation, LSE 2011.
- Lauge Poulsen, and Emma Aisbett. “When the Claim Hit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Bounded Rational Learning.” *World Politics* 65 (2): 273-313, 2013.

- Anthea Roberts, Pierre-Hugues Verdier, Mila Versteeg and Paul B. Stephan, eds., *Who Cares about Regulatory Space in BITs? A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Approach*. Tomer Broud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Yoram Z. Haftel,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Alexander Thomps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forthcoming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773686.
- Andrew Sayer, *Why We Can't Afford the Rich*, Bristol University, 2015.
- Karl Albrecht Schachtschneider, *Souveränität*,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2015.
- Stephan Schill, "Do Investment Treaties Chill Unilateral State Regulation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4 (5): 469-477, 2007.
- R. Shamir, "La responsabilidad social empresarial: un caso de hegemonía y contrahegemonía", in B. Sousa, (ed.), *El derecho y la globalización desde abajo*, Barcelona, Anthropos, 2007.
- Vandana Shiva, 2013, *Making Peace With The Earth*, Pluto Press 2013.
- Kavaljit Singh, *Rethinking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Critical Issues and Policy Choices*, 2016.
- Adam Smith,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Reprinted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1937.
- South Centre,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rotection: Divergent Approaches between the TPP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odel Investment Treaties*, Geneva, 2016.
- Suzanne Spears, "The Quest for Policy Space in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3 (4): 1037-1075, 2010.
- Joseph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W.W. Norton, New York, 2012,
 - and Bruce Greenwald, *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approach to growt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4.
 - *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 W.W. Norton, New York, 2015.
 - and B. Greenwald, *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approach to growt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5.
- Yash Tandon, *Trade is War*, OR Books, New York, 2015.
- Alejandro Teitelbaum,
 - *La armadura del capitalismo. El poder de las sociedades transnacionales*, Icara, Barcelona, 2010.
 - *Trabajar eficazmente para poner límites al poder económico transnacional*, 2016 <http://www.rebelion.org/noticia.php?id=197541>.
 - *El papel desempeñado por las ideas y culturas dominantes en la preservación del orden vigente*, Editorial Dunker, Buenos Aires, 2015.

- La armadura del capitalismo. El poder de las sociedades transnacionales en el mundo contemporáneo, Antrazyt, 2010.
-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Socialising losses, privatizing gains. How Dutch investment treaties harm the public interest, Amsterdam, 2015,
 - State of Power, 2015.
 - State of Power 2016. Democracy, sovereignty and resistance. TTIP: Why the World should beware, 2015.
- Antonios Tzanakopoulos. (forthcoming). “Masters of Puppets? Reassertion of Control through Joint Investment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States’ Reassertion of Control ov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Gus van Harten,
 -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Public Law, Oxford, 2007.
 - Public State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http://www.osgoode.yorku.ca/public-statement-international-investment-regime-31-august-2010/>.
 - Key Flaws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proposal for Foreign Investment Protection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692122.
 - Sovereign Choices and Sovereign Constraints: Judicial Restrai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Carl Wellman, The Moral Dimension of Human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Jason Yackee. ‘Do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Promo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ome Hints from Alternative Sources of Evidence,’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1:2. 2010.
- United Nations, A New Global Partnership: Eradicate <poverty and Transform Economies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May 2013.
- UN Global Compact,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17 June 2013.
- UNCTAD. 2000.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1959-1999.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UNCTAD. 2010. Denunciation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and BITS: Impact on Investor-State Claims. IIA Issues Note, No. 2 (December). Geneva: United Nations.
- UNCTAD. 2012. 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eneva: United Nations. UNCTAD. 2012,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 UNCTAD 2014, 2015, 2016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s.
- UNCTAD 2014, 201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s.
- UNCTAD 2016 Rethin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Vol. I, Making the Case for Policy Space, Vol. II: Country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Geneva, New York.
- World Bank Rapport sur le développement dans le monde 2016: les dividendes du numérique, 2016.
- WTO 2015 Annual Report.

- Jean Ziegler, Ändere die Welt! Warum wir die kannibalische Weltordnung stürzen müssen., C. Bertelsmann, München, 2015.
-